

教师代表于漪：

# 种子同时撒播精神良知

## 中国的教育一定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

不是中文系出身的于漪从事了近60年的语文教学和研究,她提出的“教文育人”和“弘扬人文”两次重要语文教育改革思想,都在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,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对此,于漪认为,她是学教育的,教过历史,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教了语文,可能站在语文外面看语文更多,不受很多思想的束缚。

“我有几个参照,一是我始终认为育人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古今中外谈到教育,聚焦点都是培养人,我觉得育人不是一个抽象概念,而是非常具体的,培养人着力在培养人的精神。二是育人一定有时代特征,尽管古今中外都讲的是‘人’,但对人的概念、人的内涵

是有区别的,真善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不同的认识的,因此我们今天培养的人一定是要具有现时代的人的特点。中国的教育一定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!”于漪说,这是她对教育的认识。

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,碰到很多问题,于漪就去寻根追源。“语文课应该是最感动学生的,但为什么语文课感染力、辐射力不断下降,甚至学生厌学?这里面有外界的原因,比如功利,不少人认为学外语更好找工作赚钱等。”于漪说,这其中的根源其实要追溯到100多年前。1904年,清政府颁布《奏定学堂章程》,自此我国开始建立起崭新的学制和独立分设学科的教学体系,“当时对中

国文学的定位,关键词就是实用、训练,这实际上影响了100年来我们的语文教学,语文就是实用工具。很多教师和学生对母语意识淡薄,认为学语文就是学工具。”

于漪一直认为,我们的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,母语教育不仅仅是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,在理解运用语言文字的同时,还应该把母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撒播到学生心中,建设他的精神家园。“语言是人独有的,按照过去的教学大纲,‘语文’是工具性和思想性结合起来,但其实思想性不足以涵盖语文的全部,因为它还有道德、情操、审美、文化。而‘人文’能够全覆盖,因为语言是和思维、情感同时发生的。”

于漪认为,语文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一样是直接指向人的,“数学研究数字、图形、空间,物理研究物质结构的规律,化学研究化学元素结构等,只有语文是直接指向人的,它跟人的思想、情感、能力、品格、气质联系在一起,我才提出语文的基本特点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结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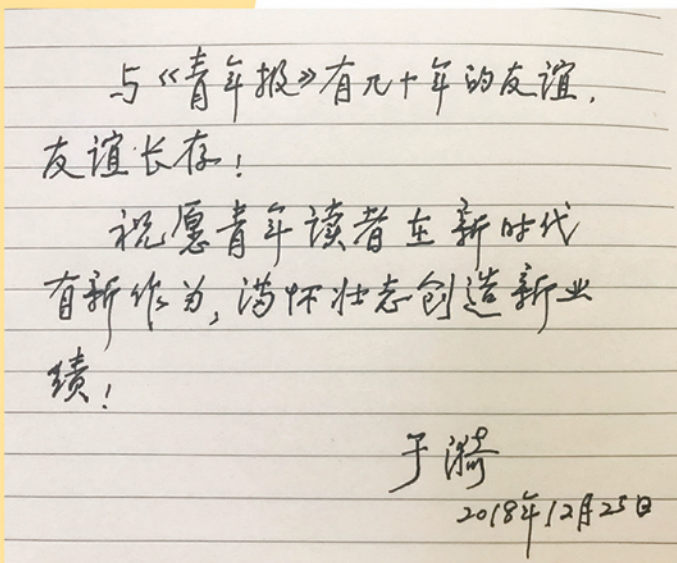
在于漪看来,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,脱离了人文,语言就变成躯壳,学不好。人文性和工具性是语文的两个面,就像洋葱的皮和肉一样,是分不开的。“但是长时间以来,我们一直在语文的形式上下功夫。”于漪认为,剥掉内涵的语言文字是没有生命力的,课也没有魂了,“最最感动孩子的一定是非

常精湛的语言文字,装载着深邃思想、卓越智慧、历史风云、世态人情,把这些直接打动孩子的东西剥离,只在语言文字形式上操练,怎么感动学生?语言文字的表现力、生命力的呈现,一定是有它极其丰富的内涵,注入语言文字的生命。”

在于漪的推动下,21世纪的课程标准里已经吸收了这一意见,把“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特点”放进了课程标准里。于漪坦言,这一过程中也是受到了很多非议,“过去只提‘双基’(语文知识、语文能力),这次21世纪的课改提出了语文素养,语文素养是立体的、多功能的。而今,提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,更是进一步的发展。”



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



## 上海基础教育的改革创新一直走在路上

上世纪80年代,教育界还没有一个人系统完整地研究过教师学,于漪把这个课题揽在了心里,完成了两本教师学著作,《现代教师发展丛书》和《现代教师学概论》,教育部把它们作为全国教师教育的培训教材,《现代教师学概论》成为中国第一部研究现代教师学的理论著作。今年,于漪将自己多年来的经历汇编成书,整理成了500万字的《于漪全集》。

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教育的发展,于漪认为,与其他各条战线一样,教育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“改革开放之初,上海的校舍很困难,教育经费也十分紧张,那时城市里的学校很多校舍都是危房旧屋,没有操场;农村里的校舍更是简陋,校门口没有一条像样的大路,教室里都是泥地,一下雨就渗水,乡村学校老师每节课发两支粉笔。”于漪说,在“再苦不能苦孩子,再穷不能穷教育”的指导思想下,各级政府想了各种办法支持教育,一方面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加大教育

经费的比例,另一方面也鼓励学校搞三产创收。

教师工资待遇方面,上世纪80年代,一个本科毕业十几年的青年教师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8.5元,“当时一本《收获》杂志1元钱,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58本杂志。”于漪提出要给教师适当的补助,“后来市里开会决定,每个教师每月加10元津贴。我至今都感激不尽,因为在当时每月能增加10元是很不容易的,对教师是很大的鼓励。”

让于漪印象深刻的是,上世纪80年代,上海出现入学高峰,为了满足学生入学需求,市人代会期间,于漪等教育界代表写提案要求增加教育预算,“后来人代会最终决定增加教育预算。为教育改变预算,这是唯一一次。”此后,各个层面的教育预算大幅增加,“这对我们教育硬件的改变是关键性的一次。”

于漪介绍说,接下来上海为教育专门立法,发布《上海义务教育条例》,比全国提前了一年,为全国的义务教育立法做了很好的铺垫。从此上海的义务教育走向

法治的轨道,经费有了保障。

“在教育方面,从硬件再到质量的提升,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。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期课改,上海有了高考自主权,有了自己的教材、课程标准;现在二期课改还在进行。”于漪说,上海一直对育人抓得很紧,培养什么人、为谁培养人一直思考得很清晰,立场很坚定,1980年代,上海就制定了两纲教育(民族精神纲要和生命教育纲要)。

“上海的教育一直在探索,现在我们又提出优质均衡,这个均衡不是把高的拉下来,而是通过集团化办学等达到‘优质’均衡,上海基础教育的改革创新一直走在路上。”于漪说,现在上海小学师资的状况总体上已经比较好,高中这一段也可以,初中相对比较薄弱,因此上海又推出了加强百所公办初中的“强校工程”,“上海教育一直坚持问题导向,有什么问题就来破解,而破解始终是站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要先行先试的高度,敢于改革,勇于改革,但是初心不变。”